从总理的“心头之痛”看执政良心

李克强总理记者会的各种细节，很有时代感和画面感。总理三次表扬外国记者的流利中文，并且关注到提问人民系“三栖”记者的多重身份，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法人微博，等等，见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愈扩大，而总理记者会的传播方式，也随着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新老媒体的融合而日趋丰富。

新的时代，新的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叠加冲撞，大国总理着实难当。和去年的第一次记者会比起来，李克强总理的语速明显放慢，平实淡定中，透着字斟句酌。“现在我们看得更多的是困难和问题”，和总理一样，15位记者的提问，也围绕着困难和问题：马航失联飞机、反腐败、雾霾、房地产、金融“钱荒”、经济下行压力、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和矛盾……

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纠结？李克强总理的几句大俗话，透出他的施政风格，“凡事不患难，但患无备”，“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千一寸胜过说一尺”。更能打动人心的，是总理关切民瘼、直击民生细节的人本情怀。

有记者问及房地产时，表述很宏观，而总理的回应却具体而有温度，把话题引向了最底层民众的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建设：“现在我们国家城镇集中连片的棚户区还居住着上亿人，可以说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几百个人一个旱厕，特别是北方，到了冬天居民入睡要带着棉帽、穿着棉衣，这可以说是政府心头之痛。”

北方老百姓穿着棉衣睡觉、几百人一个旱厕……总理的心头之痛，是有画面的，有草根民众的面孔的。“（棚户区）今年至少要再改造470万套以上”，因应解决的数字脱口而出。联想到他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直言，“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这里透出的，不是随机应变的辞锋，也不是随口敷衍的大言炎炎，而是一个人民政府公仆应当具有的执政良心，这是能够凝聚民心、燃起信心、激发决心最重要、最珍贵的行政理念。

总理诸多“心头之痛”，在他数次凝重应答中十分醒目：

——我和在前方的中国一艘搜救船船长通话，请他尽力再尽力；

——许多人早晨一起来，就打开手机查看PM2.5的数值，这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治雾霾不能等风盼雨；

——我在基层曾经访问过一些“零就业”家庭，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真是毫无生气，没有希望。

像这番话中蕴含的分量，就是他和他的团队面临的最集中的改革痛点和难点：“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你放权，有些人的权就少了。放宽市场准入，增强市场竞争力，现有的一些企业就会感到压力。但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尤其是让广大人民受惠，我们义无反顾。”

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这本来是人民政府的应有之义。竭尽所能，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这正是人民公仆份所应当。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誓言，政府就是应该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有公平发展的机会，我们要把公正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

把公正贯彻到社会最底层，是化解李总理“心头之痛”的根本药方。从记者会看，这些药方有的已经开出，有的正在斟酌。但愿总理的“心头之痛”能渐渐化解，甚至变生出百姓的“心头之喜”。**李泓冰**

诈骗信息泛滥应追责运营商

现在很少有人没有遇到过诈骗的。从街头到网上，骗子会设置各种各样的“局”引人入彀：过去以中奖为诱饵，多通过信件和邮件实施诈骗；现在则以电话为手段，经由威胁利诱让人受骗上当。

通过电话诈骗，骗子一年能有多少“收益”？在全国人大会上，曾经当过20年警察的人大代表陈伟才道出了一个惊人数字——电话诈骗去年掠走国人100亿元！在这100亿元里，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运营商从中获利10亿元！

陈伟才在会上展示了《2013年被骗100亿元电话诈骗利益分配图》和《跨境电话诈骗犯罪集团架构图赃款流向图》。图表显示，运营商在这个“诈骗蛋糕”中获得10%的利益，银行则在这个蛋糕中获得3%的利益。为了这13%的利益，事主需要付出100%的代价。

那么，运营商是如何从骗子手中牟利的？陈伟才告诉我们，电话诈骗的“源头”是骗子使用虚拟改号电话接通电话用户，但运营商没有拦截；而银行滥发银行卡，又给骗子创造了便利条件。更有甚者，运营商的一些员工还非法出租网络电话线路参与犯罪。

在用户频频遭受广告和诈骗电话和信息的骚扰时，我们一直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电话信息为什么能无孔不入地不停深入无数用户的终端设备？如今来电显示技术已经能让人看清对方的号码，许多人也一直在举报这些骚扰诈骗电话，但效果总是令人泄气，难道是通信技术对此无能为力？

然而，我们又有这样的经历：在给朋友发短信时，不时发现短信失踪。经过侦探式的推理之后才发现，短信中的一些词汇是短信被“没收”的原因，只要把这些“障碍词”删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说明了手机电信运营商具有很强的过滤和拦截能力。可是当面对骗子的诈骗电话或短信时，运营商的过滤拦截能力却似乎消失了，原因显然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不为”。在不为的背后，是他们不愿拦断财源——10%的利益，让他们成为骗子客观上的合谋！

但公众的损失还不仅仅是被骗了多少，还有诈骗引发的连带损失。陈伟才举例说，以公众被骗1000万元为例，运营商只赚100万元，而公安机关侦查破案还需跨境进行，国家为此要开支200万元。

手机运营商和银行都是我国目前最富有的创收大户。我们使用的手机流量超过套餐时，需要付出更高的流量费；但当我们的套餐用不完时，却要一夜归零。我们的存款利息低到只能远望物价奔跑的项背，而贷款利息却总是拥有“先进性”。手机运营和银行的高管，他们为收入所缴的税，都要远高普通人的工资……即便这样，他们仍然不愿为公众利益而牺牲蝇头小利。

运营商能尽职尽责地拦截一些带有特别字眼的短信，是因为有严厉的追责机制；但在事关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防骚扰反诈骗问题上，我们的追责机制怎么又一如既往地缺位了？

何 龙

西安市一家幼儿园在未告知家长的情况下，长期给园内幼儿集体服用处方药品“病毒灵”，有多名家长反映孩子出现头晕、腿疼、肚疼等相同症状。目前西安市已开始调查，幼儿园园长及相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涉事药品被封存送检。（3月13日《新京报》）

拿什么保护幼儿的健康和安全

自3月初，陆续有家长发现自己孩子在幼儿园服用了不明药物。这种俗称“病毒灵”的广谱抗病毒处方药，主要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流感等。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有孩子说已吃了3年“病毒灵”。

众所周知，有病才吃药，而且要对症下药。对此事件，公众一般持有这样几个疑问：幼儿园为什么要给正常的幼儿集体服药？有的幼儿服药时间长达3年之久，为什么家长迟迟没有发现？相关监管部门都去哪儿了？

一些家长称，按枫韵幼儿园的收费办法，如幼儿缺勤幼儿园就要给家长退费。如超过十天缺勤，就要退一半的托费。园方为确保孩子不生病，保证幼儿出勤率，才给孩子服药。园长承认，只是跟园里的保健医生简单商议后便给幼儿服药，目的是为预防病毒感冒，保证出勤率。到底是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还是为了保证所谓的“出勤率”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通过这样的解释一目了然。

预防孩子生病，有很多积极的办法。可以从关照孩子的冷暖上着手，可以从孩子的进食安全上着手，可以从孩子的习惯培养上着手……古人云：“是药三分毒。”药物不是一个人生存必需的空气、水源、食物，而只是用来克服疾病用的。任何药物都要在体内代谢，一般在肝脏或肾脏，加重肝肾负担，还会破坏体内的菌群平衡。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园方不会不知道，否则为何只给孩子吃，大人不吃？据报道，西安市多家医院反馈，这种药因出厂时没有做儿童临床试验，所以不推荐孩子使用。因担心副作用，西安儿童医院早就不进这种药。

长期服药的幼儿肯定会有不良反应，家长为何迟迟没有发现。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虽然表达能力有限，但是对成人的信任无限。有孩子说，“园长妈妈”说这个药吃了对身体好，是好药，所以就吃了而且回家没有说。如果家长每天都和孩子交流总结一天的成长，细心观察孩子的行为举止，或许会早些发现孩子的异常。

此次事件，折射民办幼儿园监管疏漏。近年来，由于公办幼儿园资源有限，很多民办幼儿园迅速成长起来。但是，民办幼儿园在审批、注册、管理上存在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像这样长时间、大规模地给正在健康茁壮成长的幼儿集体服药，监管部门却无一发现，真是让人惊奇又惊恐。

今天的幼儿，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拿什么保护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不仅牵动着每一位父母的心弦，还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长远发展。 **宋 华**

给孩子“跑官”

孩子想当班干部，家长该如何支持？一些家长便请客吃饭送礼，俨然“跑官”一般。家长为孩子“跑官”，不管是孩子意愿还是家长的想法，都不应如此这般，完全可以让孩子自己去争取，这样既锻炼了孩子，也净化了社会风气，何乐而不为？

锡 兵 文/图

金庸读博与官员读博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逐梦想，读博不问出身。2009年7月，时年38岁的辽宁锦州下岗职工、三轮车夫蔡伟，被正式录取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古文字学大家裘锡圭先生。2010年，时年86岁的金庸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该学位货真价实，一时传为佳话。

读博，三轮车夫可以，武侠小说大师可以，官员自然也可以。不过，每每传出官员读博的消息，总有质疑声。需要厘清的是，博士作为最高学历，是一个人学术能力的表现。质疑官员的博士头衔，本质上是一种“打假”行为，即打假的“博士帽”。官员若是努力求学，起码精神可嘉。即便图虚名、追求高学历，若能一丝不苟完成论文，还说得过去，怕就怕“不学无术”。官员读博备受质疑，原因在于公众认为，官员平时公务繁忙，在职获得博士学位，总要听课，还要完成论文，哪能抽出时间？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落马后，人们发现他拥有博士学位，但有两个疑点，一是他在北京工作，却舍近求远，到西南财经大学读博；二是他原来的专业是历史，却读经济学学位，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拿到博士学位。疑点重重，被嘲笑为“权力文凭”，就在所难免了。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感叹，“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为此，著名学者葛剑雄直言：“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金钱的介入。”并建议相关部门查一下王益这顶博士帽的来历，从中发现一些研究生和学位工作中的弊病，以采取切实的防范和改进措施。这确有必要。

同是读博，金庸当年在剑桥大学读博所受的争议就比较少。金庸本是剑桥大学荣誉博士，据校方介绍，荣誉博士的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但金庸仍然申请到剑桥读博，经过严格审查，校方同意后，金庸偕太太飞赴英国，像许多留学生一样租房子，认认真真听课，老老实实写论文。其间，他谢绝一切与学业无关的社会活动，碰到有人索要签名和合影也婉拒。据报道，校方对金庸的博士论文组成一个有20多位教授的委员会审核，金庸研究的是唐代盛世时期东宫太子继承皇位制度问题，论文完成后，其导师赞曰“没有学者对此做过如此深入的研究”。

据统计，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数均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另在国外，不少官员都有博士学位，可以预见的是，以后博士官员会越来越多，这绝非坏事，关键是他们的高学历是否皆真金白银？身居高位，用权力拿学位，不正常；而热衷于馈赠博士帽的高校，是不是也很不正常？ **秦淮川**

带薪休假不落实 分省分时没意义

“全国各地自然条件、文化习俗差异大，集中统一休假很难发挥优势，建议实行分省分时带薪休假避免‘黄金粥’。”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钱学明建议说。

分省分时休假采取的是“全国统筹，地方灵活”，以及“交错出行，分散实施”。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措施确实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其原理跟城市交通拥堵时，城市管理者实行的“错峰出行”如出一辙。若真能达到“错峰出行”的效果，当然值得提倡和鼓励。

不过这仅是理论上的假设，建议者可能忽略了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黄金粥”的拥挤，恰是因为带薪休假执行不力所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于其权利能够获得保障，灵活休假和个性安排不存在问题，并在实际中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而恰恰是数量占多数的其他群体的休假权未能获得保障，“带薪休假”还处于权利空白，从而使得灵活和个性出行的需求，被政策性挤压到了法定假日期间，并带来出行的拥挤。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法定假日不是很多，却很少出现中国式“黄金粥”的原因所在。

在带薪休假未能充分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分省分时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若是带薪休假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自由的安排，那么分省分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反倒会对个人的权利形成限制。

再从可操作性来看，分省分时也存在着很大技术性难题。首先是节日安排的统一性。比如五一、中秋、国庆和春节等假日，都有着独特的意义，而这样的节日安排，其本身是无法进行调剂，总不能让一部分人不休春节而调整到其他地方。其次，如何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谁在前面谁在后面，谁在旺季谁在淡季，如何让分省分时更加科学，面临着很多的障碍与挑战。同时，按照简政放权的要求，休假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其有不受干扰的权利。分省分时的实施反倒会形成权利干预，这样的结果恐怕是提议者和赞成者所未能预料到的。

分省分时休假避“黄金粥”看似初衷良好，实则并不合理，其忽略了几个关键前提，一是“黄金粥”的产生根源，不是休假制度安排不合理，而是权利保障机制执行不到位；二是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能干预太多，虽然“黄金粥”是个社会管理问题，但根本上还是市场供需问题；三是存在着实施的技术性障碍，导致其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即便勉强实施，也可能成为摆设。同时应当看到，随着交通拥堵的升级和集中出行带来的种种问题，很多人的休假方式已然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个性化和随意化，这样的改变何尝不是一种进步？

堂吉伟德

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境遇？会出台怎样的调控？李克强总理昨天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凡事不患难，但患无备”。很形象，很生动，给出了今年宏观政策的基调，更重申了那条似乎被人遗忘的原则——增长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增长之斧”两面磨 才能更快更好

昨天的困难，就是今天的镜鉴。一度，我们的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金融领域出现所谓的“钱荒”，正因为及时的预调微调，中国经济才避免了硬着陆，顶住压力实现了质量更好的增长。今年的政府工作，定会汲取经验与教训，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因为，这条下限托着就业、托着民生，更托举起中国巨轮的全身。

总理动情讲到，基层没有一个人就业的“零就业”家庭，“真是毫无生气，没有希望”。事实上，这么大体量的发展中国家，每年数百万毕业大学生，数以亿计的待进城农民，就业是任何决策者都不能、也不敢忽视的社会底线。其实，这与转方式、调结构并不矛盾，我们要的绝不是空气清新、人人下岗的局面。中央说的转方式、调结构，不是穷转，不是穷调，而是富转、富调。这一点，各地主政官员必须牢记。

“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让发展惠及每一个普通人，这样的GDP才是贴近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这就要求，增长之斧需要磨好两面，一面是坚决保增长、保就业，坚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另一面提质增效、宣战雾霾。两面相得益彰，增长的越好越稳健，环保才越有底气。否则，只磨斧子的一面，既不是市场经济的取向，更不是社会主义的追求，只能越磨越钝，费力不讨好。

历尽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什么风浪都见识过，什么坎坷都跨越过。只要以民生为念、以增长萦怀，我们的发展必将在稳中求进、爬坡过坎中释放无尽红利——7.5%左右的增速，我们有信心，让增长惠及更多的民生，我们更有决心。 **周人杰**

取消假释制度不如完善监督

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在广东团全团会议上表示，建议取消假释制度，建立监狱医院专门收监保外就医人员。他同时表示减刑案件应当公开开庭，通知受害人家属出庭并发表意见。（3月12日《新快报》）

朱列玉代表举例：“2009年，广东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他搞了假‘保外就医’，一天牢都没坐过。”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对于减刑，假释以及保外就医，舆论有个形象的说法是“贪官的越狱通道”，一语道破问题所在。

尽管如此，我仍不认同取消假释制度的建议。假释制度虽然容易被特权阶层所利用，甚至引发司法腐败，但问题并不出在这个制度本身，不由分说地加以取消，固然痛快，却有因噎废食之嫌。至于建立监狱医院专门收监保外就医人员，目前我国的司法资源本来就十分有限，而保外就医也只是小概率事件，一旦付诸实施，一方面成本太大，另一方面利用率也十分有限。

假释作为刑罚执行制度，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事实也证明这是一项十分成熟的制度。刑罚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罪犯，更在于通过惩罚来教育和改造罪犯。或者说，惩罚只是手段，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罪犯悔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才是最终的诉求。而假释制度就是这一法理原则的具体体现，通过对一些真心悔罪、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有条件地予以释放，有利于体现刑罚宽严相济的司法原则，鼓励和激发罪犯更好地改造，客观上也可以节省执法成本和负担。退一步说，目前假释更多适用于特权阶层固然是一种司法不公，但如果取消，事实上剥夺了其他人适用这一制度的机会，岂不是更大的不公？

假释、保外就医等制度之所以被滥用，异化为特权通道，原因在制度之外。通俗地说，就是“好经被念歪了”。以林崇中为例，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因为搞了假的“保外就医”一天牢都没坐过，不是“保外就医”的错，而是人的原因，确切说是“权力通吃”的结果。因此，取消假释制度，不如完善监督，让制度真正刚性起来，不被权力所染指和操纵。

完善监督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制度的完善。以假释为例，何为“确有悔罪表现”，何为“不致再危害社会”，必须有更为明确的可量化的标准，否则自由裁量权太大，很容易形成制度“后门”，被一些有权有势者以及执法人员所利用。

二是充分的司法公开。假释、保外就医等制度，客观上是减轻了对罪犯的惩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而在操作上必须慎之又慎，最好的办法就是司法公开，让舆论和公众来监督制度的运行。譬如朱列玉代表提出，减刑案件应当公开开庭，并通知受害人家属出庭并发表意见。

最重要的一点，当然还是完善问责。司法和执法机关内部人员帮助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获得假释、保外就医，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司法腐败，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严厉加以打击。 **吴龙贵**